

击剑——大学时代多彩的一章

○莫为泽(1979级水利)

在母校100周年华诞之际，不由使我回忆起在大学的那段美好时光，最难忘的是击剑队四年的训练与比赛生活。在多年后的今天，我想说，击剑运动使我受益良多。

与击剑运动结缘

大约是1980年，一个偶然机会，我经过体育馆前厅，恰遇同是清华子弟的1977级学长杨嘉实，他正帮助郑继圣老师张罗招收“文革”后击剑队的首批队员。我是高度近视，根本没想到要报名，他却二话不说把我拉到了郑老师的面前，当时郑老师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后，叫我模仿他做了几个动作——现在依稀记得其中一个动作是持剑敬礼。让我有些意外，不久就被录取了。我的业余击剑运动生涯就由此开始了。

新组建的击剑队当时只有男子重剑、男子花剑和男子佩剑三个剑种，由于嘉实随郑老师学了一段时间佩剑的原因，我就随他练起了佩剑。同时学习佩剑的还有精仪系1979级的张毅虹和季昂两位学友。

从“击剑训练班” 到“北京高校击剑队”

郑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体育学院重竞技专业的首批毕业生，在击剑圈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大力提倡在大学生中开展击剑运动，并在“文革”前带领清华



莫为泽学长（左）全家在埃及

大学击剑队创造过辉煌的战绩。十几年后重新组建击剑队，可以说完全是依靠郑老师的一己之力。在我印象当中，当时学校的体育经费紧张，加之全国高校均没有开展击剑运动，击剑运动尚无法为学校赢得荣誉，所以初期的击剑队并无名分，属“三无队”——无专职教练，无经费，无待遇。郑老师在正常教学之外是校游泳队的教练，带击剑队只能是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击剑队没有固定的运动场地，每次训练都是在体育馆周围“打游击”；击剑装备基本上是“文革”前击剑队留下的家底，自己动手在断剑上捆绑竹条的器械使用了很长时间；队员们也不享受运动队队员的待遇。那时的击剑队只是“击剑



1983年7月，参加北京市青少年击剑赛青年组比赛成员。左起：蔺林、翟庆志、莫为泽、张毅虹、刘佳

训练班”。

在郑老师不断呼吁和辛勤努力下，1981年底郑老师争取到了组建北京市高校击剑队参加北京市第六届全运会击剑比赛的机会，郑老师成为击剑队的专职教练，队内购置了一些新的器材，我们也领到了印有“北京高校”字样的运动服，为此郑老师带我们到五道口照相馆留下了“文革”后击剑队的第一张“全家福”。此后击剑队得以继续发展壮大，我们毕业数年之后，郑老师率领清华大学击剑队再次取得佳绩。

从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开始 逐步体会到击剑运动的乐趣

入队初期是接受击剑专项身体素质和基本功训练，内容包括短距离的冲刺跑、折返跑、持剑臂的力量训练、快速前后移动的基本步伐、弓箭步以及进攻防守的基本手法等。出于对队员人身安全和防止宝贵器械损坏的考虑，郑老师严禁队员之间使用器械“切磋”。那时，我最期待的便是郑老师的一对一指导。在这样的训

练中，郑老师身着教练护具、手持长剑，面对面教授我们进攻和防守的动作与技巧，纠正错误动作，整个训练过程既紧张又兴奋。

数月后，方进入实战对练。初次对练我们动作僵硬，进攻防守无章法，犹如街头儿童对打——毫无观赏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摸索，手脚的配

合终于渐渐协调，也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防守反击和进攻转移等组合动作了。此时的击剑运动由纯体力活儿变成了技术活儿，本来枯燥的训练变得有趣多了。但在这个层次我们的技战术水平进步得很艰难，还很难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郑老师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走出去”的方式，带领我们到专业队去观摩训练。通过认真观摩和直接与专业运动员面对面地交流，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击剑运动的魅力，也激起了我们要刻苦训练、勤于思考，去追寻精彩对决的决心。

“难觅对手”

难觅对手可绝对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独孤求败的意思。那时击剑运动在北京的普及程度很低，除了北京击剑队、北京体育学院和一些业余体校外几乎再难寻到练习对象了。我在击剑队的近四年时间里，走出去训练的次数有五六次，其中有四次留下较深的印象。

1981年底，郑老师带我们去北京体育学院是第一次外出训练，对方是竞技学校

□ 庆祝建校100周年

的学生，这些学生是为1984年、1988年奥运培养的选手，年轻、身体条件出众，通过训练发现了我们自身明显的缺陷，也初次尝到了走出去训练的甜头。

1982年，为了备战北京市第六届运动会击剑比赛，郑老师带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京击剑队合练了两次，当时的北京击剑队代表了国家的击剑水平。第一次是2月底，以教学比赛为主，我队4名佩剑队员全部参加，对方派出了4名二线队员和一名业余体校队员。比赛采取单循环制，共20场（我队每人打5场，对方每人打4场），最终的比赛结果是2胜18负——惨败而归。我虽然侥幸胜了2场，但也有2场“剃了光头”，一分未得。此次教学赛让我们看到了与专业队二线队员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3个多月后的6月，我们再次参与了北京击剑队的合练。这一次是与北京队的主力队员在一起训练，机会非常难得，训练中我们虚心向对方请教。训练结尾时郑老师安排几场指导比赛，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与一名主力队员（运动健将）打的一场指导赛，虽然2：5负于对方，但亲身体会到了高水平剑手快捷凌厉的攻势，我输得心服口服，并且受益匪浅。从与北京击剑队前后两次合练的结果看，我们全体队员在郑老师的指导下，击剑实战水平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1982年3月，郑老师还安排过一次与铁路系统击剑队的佩剑友谊赛，双方各出3名队员，单循环共9场，我队出场的是杨嘉实、季昂和我，比赛结果是我队5胜4负——险胜，虽然我个人仅取得1胜2负的成绩，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却大大鼓励了我们继续前进的信心。

两次正式比赛

从重新组建击剑队到1984年6月我毕业离队，击剑队共参加过两次正式比赛。一次是北京市第六届运动会击剑比赛，另一次是北京市青少年击剑赛。

北京市第六届运动会击剑比赛是我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正式比赛。在1981年11月的一次训练中，郑老师告诉大家，次年举行的北京市第六届运动会已将击剑项目列为重点项目，北京市高校将选拔出10名选手参加击剑比赛，要大家做好参加选拔的准备。鉴于北京其他高校大多还没开展击剑运动的情况，最终代表高校参加比赛的选手极有可能以我们队为主。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队员们的训练热情。正是郑



1983年参加北京市青少年击剑赛青年组的比赛后，郑继圣教练（中）和莫为泽（左）、张毅虹（右）合影

老师对击剑运动的执著，才使我们有了机会。12月曾有一位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学生随我们参加了两次佩剑的训练，最后却不了了之。击剑队为了此次比赛，还在1982年初的寒假中特意安排了一周的冬训。1982年3月初，郑老师告知高校击剑正式队员名额为5名，这就意味着参加训练的10个人中将有5人无法参加比赛。3月底郑老师与我谈话，当时我有伤在身，考虑到全队的整体利益，我做出了不进入高校击剑队的决定，次日公布了正式队员的名单。尽管如此，出于对击剑运动的喜爱，我决定作为编外陪练队员留下继续参加训练。5月初，我们这些编外队员补发到了正式队员的运动服，似乎看到了参赛的希望。直到6月中旬，看到北京市六运会击剑比赛抽签结果，我才确定可以参加比赛。北京市六运会佩剑比赛共有1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流程（似乎）是第一轮每组4人，每组前3名共12人进入第二轮比赛；第二轮每组6人，每组前3名共6人进入第三轮比赛。我和队友张毅虹抽签抽在了一组。7月4日，上午花剑前二轮比赛，下午重剑前二轮比赛和佩剑第一轮比赛，比赛结果是我队花剑和重剑选手全部未能闯入第三轮。我在佩剑比赛的第一轮小组赛中2胜1负与另一组的队友季昂进入次日的第二轮比赛。7月5日下午，我和季昂均在各自的小组中遭淘汰，无缘前6名。当晚队内召开总结会，大家表示参加北京市最高水平的击剑比赛是我们的荣幸，与高手面对面地较量增长了见识，比赛的结果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技战术水平。

第二次正式比赛是北京市青少年击剑

赛。该项比赛于1983年8月21日上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击剑队训练场举行，清华大学击剑队参加了青年组的比赛。青年组佩剑比赛在4号台进行，有6名选手参加，其中第1~4号选手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5号是队友张毅虹，我是6号。单循环每人打5场比赛，我2胜3负，张毅虹1胜4负，最终我俩都因小分落后，排名分列第四和第六。

击剑运动带给我的益处

大学时代无疑是我50年人生中最绚烂多彩的时光，而参加击剑运动又是其中十分浓重的一笔。击剑运动不仅陪我度过那段美好的人生，也对我此后的工作与生活产生了影响。

击剑比赛时，两人四目对视，试探性地击打、进攻、防守、反击，容不得丝毫的胆怯和犹豫，比分落后时要及时调整心态和战术，面对强手要斗智斗勇一拼到底，面对挑战要敢于积极主动地出击，面对困难时要具有不克服困难不罢休的气势。这种精神、态度与气势也会潜移默化地体现到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中。毕业以来，难免会遇到工作上的压力和生活中的不顺利，我会不时用从击剑运动中体会到的精神去激励我迎难而上、积极进取，从而稳步走到今天。

击剑运动带给我的益处难以一一道来，我想与我有相似经历的击剑队队友们也定有如此感受。击剑队凝结了我们青春的宝贵回忆，也给予了我们不断追寻和奋斗的运动精神。在此我谨以最真挚的心情，感谢清华大学击剑队，感谢郑继圣老师。